

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 (1937—1945)

潘 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录▶▶▶

序 张宪文/001

导 言/001

第一节 缘起与学术史/001

第二节 研究区域/004

第三节 框架结构和资料分析/008

第一章 沦陷时期江苏社会的概况/014

第一节 社会混乱与生命财产损失/014

(一) 社会混乱:烧、杀、抢、掠、淫/014

(二) 生命财产损失/017

第二节 沦陷初期江苏地区各阶层状况/024

(一) 国民政府官员:弃民而逃/024

(二) 土匪及地痞流氓:趁火打劫/026

(三) 普通民众:恐慌/028

第三节 “清乡”运动/029

(一) “清乡”运动的目标/029

(二) “清乡”运动的过程及其组织系统/032

(三) “清乡”运动的效果分析/034

第二章 日伪基层行政组织的组建/047

第一节 过渡性组织:“维持会”/047

(一) “维持会”的成立及其人员构成/048

(二) “维持会”的职能及其与日本占领者的关系/053

第二节 县政权的组建:县公署、县政府、清乡特别区公署/056

第三节 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从城乡村坊制到区乡镇制/062

(一) “清乡”前日伪建立基层政权的尝试/062

(二) 汪伪建立基层政权的措施与困境/066

第三章	日伪基层政权职能(上):政治统治/079
第一节	“复兴建设”——以教育复兴为中心/079
	(一) 教育复兴及其效果/080
	(二) 复兴绩效甚微原因分析/083
第二节	基层社会的控制方式——编制保甲/086
	(一) 保甲的编制及其职能/086
	(二) 保甲职能甚微及其原因/089
第三节	恐怖政治——军警宪特的统治/093
	(一) “政治工作团”/093
	(二) 军警组织/096
	(三) 特务组织/105
第四章	日伪基层政权职能(下):经济汲取/116
第一节	日军军粮征购/116
	(一) 日商压价收购期(1938年~1940年底)/116
	(二) 日伪行政机关代为征购期(1941年~1943年底)/118
	(三) “米统会”垄断收购期(1944年~1945年8月)/123
第二节	税收机构与清乡区税收/128
	(一) 税收机构与税收能力/129
	(二) 清乡区税收/135
第三节	租赋并征/142
	(一) “业主”的抗议/143
	(二) 伪官府의 “不满”与对策/145
第五章	日伪县行政人员考察/159
第一节	县一般行政人员来源/159
第二节	县知事、县长的任免与群体结构/166
	(一) 县知事、县长的任用与任期/166
	(二) 县知事、县长的年龄与籍贯/171
	(三) 县知事、县长的资格、出身与文化程度/174
第六章	日伪区乡镇保甲长/185
第一节	区长/185

	(一) 区长的年龄结构、出身与学历/186
	(二) 区长的职权与腐败/189
第二节	乡镇长/193
	(一) 乡镇长的年龄与来源/193
	(二) 乡镇长的受教育程度/196
	(三) 乡镇长的职权/198
	(四) 乡镇长所承受的压力/200
第三节	保甲长/203
第七章	合作与抵制：日伪基层行政人员心态及其命运/212
第一节	合作的心理分析/213
	(一) 上层行政人员：保境安民、保全财产、牟取利益/214
	(二) 一般行政人员：求生欲望/220
	(三) 乡镇保长：投机与战战兢兢/222
第二节	抵制及其动机/224
	(一) 消极抵制/224
	(二) 积极抵制/226
第三节	日伪基层行政人员的命运/230
	(一) 国民政府对日伪基层行政人员的处置/230
	(二) 中共对日伪基层行政人员的政策和措施/233
结 语	/243
资料文献及参考论著	/247
	(一) 文献资料/247
	(I) 未刊档案资料/247
	(II) 报刊资料/247
	(III) 已刊档案和编印资料/248
	(二) 参考论著/250
	(I) 专书/250
	(II) 论文/254
	(三) 外文资料和论著/256
致 谢	/258

序

张宪文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潘敏博士撰写的专著《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在她的学术事业上是件值得祝贺的事情。潘敏博士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比较关注妇女问题,并有一些学术成果。2000年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我建议她改变学术研究方向,研究伪政权史。这不是说妇女问题或妇女运动史不重要,而是希望她利用江苏地区的资料条件,进一步拓展伪政权史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们,即对伪政权史的研究作出了优异成绩,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对上层伪政权的建立、日伪关系和重要人物的活动等,都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写出了高水平的著作。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随着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伪政权史的研究领域。譬如,是否可以深入考察一下日伪基层政权的状况,日伪是如何通过基层政权控制和掠夺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先后建立了伪满洲国、伪华北临时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等。日本对这些伪政权的统治模式、统治策略和政策并不完全一样。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下各伪政权的政权结构、政治生态、人员构成、地方控制、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等。通过对各伪政权的比较研究和整体性、层次性的解剖,将伪政权史的研究引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潘敏博士以苏南、苏中为中心,对 1937—1945 年间江苏地区日伪基层政权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她几乎跑遍南京和苏南地区的各档案馆、图书馆,尽可能多地掌握伪基层政权的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的档案史料。她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史学的实证方法,在厘清日伪基层政权组织过程的基础上,深入解剖了基层政权的组织结构、政治和经济职能,以较多的篇幅考察了县区乡行政人员的来源、年龄、教育程度及权力分配等。用大量的实例,分析了在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基层行政人员的复杂政治心态和欲求,避免了对伪政权各类人物均简单化地给予道德评判的倾向。伪基层政权服务于日本侵略者的重要职能之一是为日军征购军粮和征收赋税,而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却研究甚少。本书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和数据,切实地论证了日本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使我们更明确清晰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潘敏博士的专著对汪伪基层政权所作的全方位的、立体的考察,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伪政权存在的非正义性和不合法性。这一政权缺乏存在的社会基础,它不可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它必将与日本侵略者一起被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所摧毁。本书虽有不完善之处,但对伪政权史的研究依然起着添砖加瓦的作用。

2006 年 3 月 5 日

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导言

第一节 缘起与学术史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和造成的破坏超过了近代以来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它在中国攻城掠地,屠杀民众,在中国资源富饶的地区建立了由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各种傀儡政权:1932 年 3 月,利用末代皇帝溥仪在东北成立“满洲国”;1935 年 11 月,支持殷汝耕组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 年 12 月,扶植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继而日本侵略者又于 1938 年 3 月网罗一批北洋遗老建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9 年 9 月,日本侵略者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以及晋北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合并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0 年 3 月,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正统自居的汪精卫在日本占领者的支持下组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若要较全面再现日本侵略期间中国社会的状况及其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就需对这些傀儡政权及沦陷区社会进行详细的探讨。但到目前为止,此项研究尚未全面深入展开。究其原因,固然一言难尽,但其中意识形态的避讳可能是主要原因^①。

以往学术界对日伪政权的研究大体上集中于汪精卫、周佛海等大人物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等方面,间或亦有讨论华北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和汪伪中央政府等上层政权的组建及其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大多侧重于中日之间的政治斗争和侵略与被侵略事实本身,较少关注日军的侵略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当时中国社会内部各阶层中所引起的反应及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当然前项研究不是不重要,政治斗争、革命斗争本身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大陆史学界对日伪政权研究,仍专注于上层政权的政治和政治斗争史,忽略对基层社会的探讨。这种研究使

导
言

我们对沦陷区只有比较笼统而模糊的印象：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敲诈勒索、竭泽而渔、滥杀无辜、无恶不作，但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辞藻丝毫也帮不了我们了解认识日伪政权的实际统治状况和沦陷区基层社会的情形^②。

1937年以后的日占区实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但日本侵略者究竟如何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日伪政权是如何运作的？伪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基层政权的关系又如何？日伪基层政权的主要职能是什么？伪行政人员的实际执行情况怎样？在大量的历史著作和影视作品中，日本占领者在沦陷区兴风作浪、颐指气使，伪行政人员则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实际的日伪关系又如何？再就日伪行政人员而论，他们进入日伪政权机构的动机和心态如何？还有沦陷区老百姓对日伪统治的态度又怎样？对于诸如此类问题，我们研究得甚少。笔者选择沦陷时期江苏日伪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作为考察对象，试图对以上诸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究。

沦陷时期的日伪基层政权是学者们研究较为欠缺的课题，笔者仅见一本专著的部分章节以及几篇论文涉及于此^③。朱德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一书中，对日伪在冀东如何推行保甲制度、如何控制基层行政人员，以及日伪基层政权实际上是“两边倒”（同时为抗日政权、伪政权服务）的性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④。

张济顺在《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一文中认为，沦陷时期的上海保甲制度在组织方式上与传统保甲制度类似，执行着传统保甲制度的职能，必须负责基层社会的治安，按户征收各类捐款等，而且其与同时期的乡村保甲的职能也极为相似。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沦陷时期的上海保甲更多执行着与传统保甲不同的职能，它赋予联保连坐法以邻里间监督舆论和政治态度的职责；保甲系统被官方纳入到政治活动的轨道，把保甲制度本身意识形态化^⑤。

台湾学者罗久蓉根据1942年3月至10月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对郑州维持会的成员审讯的资料，探讨一些有关汉奸成因与历史情境的问题。她研究得出，汉奸的形成与一定的历史情境有关，就进入郑州维持会的人来说，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基于自保，有的是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有的是迫于生计而主动要求进入维持会。作者最后指出：“强调汉奸行为与情境的关系并不表示基于同情的了解，……了解并不等同于道德中立”^⑥。

美国学者萧邦齐(R. Keith Schoppa)将日伪政权的考察视角转入杭州市地方层次,发现战时杭州的通敌行为随着时间、地点和人事环境的变化,而带有不同的意义。最初的“治安维持会”、“自治会”带有更多的保境安民色彩,但不久日军的干涉越来越直接,“维新政府”和汪伪政权又相继成立“杭州市政府”,开始把地方性的通敌活动纳入到全国性的网络里,“傀儡”的性质就慢慢明显起来。尽管如此,基层的傀儡(如区长)仍然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也与战前的功能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⑦。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 Peter. Seybolt 研究抗战时期沦陷区乡村或小镇的情势颇受人瞩目。他根据县志、中共党史资料及实地采访所得,在有关河南内黄县的论著中,重建战时一个三不管“灰色地带”的地方社会状况。内黄县在抗战爆发时人口不过 20 余万,地瘠民贫,战事初起,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望风溃逃,牢中囚犯出狱大肆劫掠,民众则将县里的义仓抢夺一空,县郊四股土匪趁乱合力攻城,与守城的乡绅民团血战不休。此时日军路过,误以为遭遇抵抗,便进入县郊的村落屠杀报复。因此,这个县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里已有 800 多人丧生,其中 200 多人死于日军之手,600 多人死于自相残杀。此后数年间,这种混乱局面从未停止。县里的乡绅很快就和日军勾结,组织傀儡政权,附近的红枪会(当地称为“圣道会”)则和河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联手,进攻乡绅领导的民团,但不久红枪会也投降了日军,国民党军队则苦撑到 1940 年初降日,改编为伪军。此后内黄县一带仅存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继续与各种亲日势力进行斗争。而日军真正派往当地的兵力,不过一个小队而已^⑧。

台湾学者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基层政权的方法和关注点对本文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以吴文星的《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为例,作者在文章中较客观地考察了日据时期参与殖民政府的社会领导阶层,再现了他们与日军合作的复杂情况。初期的“留台绅商及富豪为解除台北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的混乱和不安,乃采顺服态度,期藉日军之力以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宁,确保身家安全和财富”,“台湾总督府”对他们亦采取笼络的绥靖政策,“逐渐将之纳入殖民行政和治安体制中,担任参事、区街庄长、保甲局长、保正、壮丁团团长、甲长等职务”^⑨。文中还以“放足运动”和“推广国语运动”为个案,说明这些社会领导阶层在台湾发展中的作用。

上述论著谈到了日伪统治下的华北、上海、郑州和杭州等地区的基

导言

层政权情况。关于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的状况,国内学者涉及不多^⑩,笔者所见的有:曹大臣近期对太仓的研究指出,汪伪政府成立前,日本占领者依靠其组织的所谓的宣抚班对华中地区基层社会实行控制^⑪;张生等人的新著——《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部分章节也涉及江苏日伪基层政权,并对是时基层政权的两面性、三面性作了详细的考察^⑫;再如余子道先生所著的《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清乡”运动》,对日汪清乡运动的过程和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并指出日本侵略者乘清乡之机掠夺了中国大量的物资和劳力^⑬,同时对汪伪基层政权的组建亦有所论及;两位加拿大学者巴雷特(David. P. Barrett)和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研究关注到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的建立,前者指出日伪的清乡运动是建构其基层政权的过程^⑭;后者通过研究,再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日伪政权的组建过程,从起初的自治会到后来“维新政府”治理下的县公署、再到日汪时期的县政府,同时对日汪为建立该政权“合法性”的各种政治动员也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⑮;此外,日本学者池田诚编著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亦有一章专门述评日伪政府的清乡运动并涉及日伪基层组织的运作^⑯。

已有关于江苏地区日伪基层政权和沦陷区基层社会状况的研究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学者们关注较少,研究较为欠缺;第二,在已有研究中,一部分侧重于日伪基层政权的组建,如《1937年~1945年间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占领状态下的政权的形成》;另一部分倾向于史料的钩沉,如曹大臣的《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第三,关于日与伪的关系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多强调日伪关系的一致性,另外一些则偏向于日与伪的矛盾,将日与伪分开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前者如余子道的《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清乡”运动》,后者如“The Changing Face of Collaboration: Hangzhou, 1938~1940”和张生等人的《日伪关系研究》;第四,国内学者字里行间透露出民族主义情绪,有一种“进得去出不来”的感觉,海外学者则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似乎游刃有余。这些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本文的运思、架构均有较大启发。

第二节 研究区域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后,向江浙腹地迅速推进,至12月中旬占领南京之时,日军几乎蹂躏了江苏全境。迄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江苏沦陷近8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日军试图将江浙一带建立

成支持其“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因而在这一带先后扶植了“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而且后者是沦陷区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江苏人民在日与伪的双重压榨下饱受战争之苦。

日军每占领一个城镇后,主持政治工作的“宣抚班”便积极活动,联系地方头面人物(亦有地方头面人物主动投靠日军的)建立维持会。其主要职能是替日军办理军需,顺带稳定维持地方秩序。维持会持续到1938年3月,代之以“自治会”。但在日军与中国军队拉锯之地,维持会断断续续存在时间较长,日军打来,维持会成立,日军离去,维持会随即消失。在职能和人员构成方面,自治会与维持会没有实质性差异,但前者更多体现日伪自上而下建立伪政权的过程(其职员是经过日伪方面任命的),后者则基本上是地方人士积极参与的、自下而上恢复秩序的组织^{①7}。1938年3月“维新政府”成立,6月伪江苏省政府亦宣告成立,之后不久,各县城维持会或自治会改组为县公署,其最高行政人员称县知事,直至1940年6月改称县政府、县长为止。日伪也试图在县以下建立政权机构,但在日汪清乡之前,除了在日伪据点周围建立几个区乡政权外,其余地区均在抗日军队或“游击队”的控制之下。

1938年上半年江苏各地最为混乱,首先,日军活动极其猖獗,是时甚至两三个日本兵就能溜到离铁路线10华里开外的地方打劫强奸,而老百姓却奈何不得^{①8};其次,各种各样冠之以“游击队”的武装团体遍地皆是,时论称为“遍地黄花开”,其“抗敌不足,扰民有余”^{①9};再次,土匪打劫绑票强奸,时有发生。由于这些行动并无特定目标,不但年轻妇女人人自危,家家户户亦有朝不保夕之感。

1938年6月,新四军到苏南开展敌后游击战,国民党没撤离的军队,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亦投入对日军的战斗中,日军的嚣张才略有收敛;加之,土匪、“游击队”亦在日军或抗日军队的收编和争取下趋于平静,这时农村的混乱才略有缓和。但好景不长,日军于10月纠集部分伪军清乡(此时的清乡类似于华北的“扫荡”,只有军事行动,不像后来日汪的清乡,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多管齐下),农村地区仍鸡犬不宁。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其规模、实力等方面均在“维新政府”之上。正因为如此,汪伪政权也不像“维新政府”那样对日本人俯首帖耳,而是积极主动地向日本侵略者争取更多的权利。正如巴雷特教授所言,在它五年多的生命里,汪伪政权一直为争取对民众的有效控制和真正独立于日本而努力,但对其试图达到的目标,仍相距甚远^{②0}。太平洋战争

导

言

爆发后,尤其是在1942年与1943年之交,日本帝国主义业已陷入困境。日军为了从中国战场上腾出兵力全面应付战事,不得不抛出“对华新政策”,其要旨是“强化”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加强后者对各地伪政权的“领导”,使其处于名副其实的中心地位。汪伪政权因此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对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以及对省政府以下行政事务的独自处理权^①。

汪伪政权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清乡”运动。清乡始于1941年7月,止于汪伪政权崩溃前,几乎贯穿汪伪政权的始终。清乡可视为汪伪建构基层政权、将统治触角延伸至农村社会的过程^②。过去的研究多强调汪伪政府在清乡事务上的被动性,实则它一直积极主动地参与“清乡”运动,至少在清乡初期是如此。通过清乡,汪伪建立了区乡各级行政机构和具有军事组织性质的保甲制度,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特务组织组建了较有“效率”的情报网。在清乡高峰时期,日伪对基层社会实现了较为严密的控制;且其财政收入亦有大幅度增长。但昙花一现,随着清乡日军的撤离,日伪基层政权迅速被抗日军民所渗透,大多数伪基层军政人员成为同时应付抗日政权和日伪政权的“两面派”人物。

在“清乡”运动的同时,汪伪政府还组织了“新国民运动”和“东亚联盟运动”,前者类似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比如制定新国民服、规定新国民宴席、制定了一套新国民体操;其目的是要在精神上“使人人有至诚惻怛,舍身救世之素养”;活动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后者宣扬中日“军事同盟”、“政治合作”、“经济提携”、“文化沟通”等口号。二者的主旨均在于对沦陷区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教化,但这两个运动多停留在宣传层面,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活动,其具体绩效亦不能与“清乡”运动相比。

日本侵略者在江苏基层社会的情况大致为,“维新政府”时期驻江苏各县镇的日军分为三个部分:战斗部队、宪兵队和宣抚班。战斗部队主管军事;宪兵队实际上是特务机构;宣抚班主要做政治性的工作,负责恢复日军占领区的社会秩序。1939年8月,“梅机关”^③成立,在各地设立“特高课”,分管了宪兵队某些工作。日军省一级的机构是联络部,各联络部配有联络官,但在“维新政府”时期,联络官各行其是,非但县与县之间互不关联,且省一级的联络官亦无法节制县及县以下的联络官,日军并没有自上而下建立起比较有系统有组织的联系网络。这部分是因为驻华日军各自为政的产物,部分也导源于伪政权上下级之间互不统属。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日汪“清乡”之初。“清乡”时期,日军在江苏省一级

设立了“联络部”，并先后在“第一清乡区”（苏州地区）和“第二清乡区”（镇江地区）设立“出張所”，各县也分设“县出張所”，设有联络官。日军在清乡地区各区镇没有设立联络机构，一般情况下只有一个班的宪兵队（宪兵队队员大多是中国人，领队是日本人），以表明这是日本占领区。

本文研究对象为沦陷时期江苏日伪基层政权。日伪江苏省的行政区划和实际管辖范围前后有一定的变化。沦陷初期其地理概念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体相似，实际辖区却有所缩小。因为苏北盐阜和徐州地区，于1939年2月在徐州成立了“江苏省公署徐州办事处”，但是在具体隶属方面，日本侵略军一直争论不休，海军主张划归江苏省，而陆军因先进入徐州，力主划一特别区。5月“办事处”改为“苏北行政专员公署”，军事上归华北派遣军统率，行政上隶属于日伪华北“临时政府”。1941年5月，该专署改称“苏淮特别区行政公署”（辖区增至19县），接“华北政务委员会”令。1943年5月，“苏淮特别区行政公署”接汪伪国民政府令，升格扩大为“淮海省政府”^②，成为与江苏省政府平级的行政机构，原江苏省被划分为两块。

本书考察的区域为苏南和苏中地区，即日伪江苏省政府较有效控制的地区。苏南地区除包括现在江苏省所辖各县之外（长江以南各县），还涵盖现在上海郊县的金山、松江等县，偶尔还涉及浙江的嘉兴县。苏中地区是指南临长江，东濒黄海，西以京杭运河为界，北与盐阜、淮海毗邻，包括江都、高邮、宝应、兴化、东台、泰东、泰县、靖江、如西、如皋、南通、海门、启东等14个县，需要指出的是，江苏日伪政权将这些县称为苏北，笔者为了将这些县与盐阜和徐海地区区分开来，依据当时新四军对江苏地区的划分，称之为苏中地区。之所以选择苏中、苏南地区为考察点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1938年3月“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1940年3月日军又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合并在南京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尽管汪伪政府是名义上的伪中央政权，但一直未能取得对沦陷区大部分地区的实质性控制，其统治的中心地区仅限于苏浙皖部分地区，而江苏的苏南、苏中地区又是汪伪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带。因而选择这一区域能较全面反映日伪政权在华中地区的统治方式和统治策略。

第二，从1941年7月开始，日汪在苏浙皖地区发动了历时4年之久的“清乡运动”。“清乡运动”是日伪政权试图将其统治触角延伸到

导
言

基层社会的手段,即日伪建构其基层政权的过程。苏南、苏中是日伪清乡的重点地区,其投入的人力物力为各地区之冠。深入考察这一地区,能较清楚地知晓日伪建立基层政权的过程,以及日伪在华中一带的实际控制程度。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基层政权包括县及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

第三节 框架结构和资料分析

本文结合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的有关理论和史学的实证方法,探讨日伪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程度,并分析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的心态,尽量再现沦陷时期江苏日伪基层社会的实际状况。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以及其他的一些学者认为,在日伪统治时期,对农村基层社会达到了强有力的控制^⑤,而本文的研究结论是:黄宗智等人的观点就东北和华北而言还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华中地区并不如此。实际上在江苏地区,日伪仅实现了对县一级政权较有效的控制,至于县以下基层社会及基层政权只在清乡高潮阶段达到了短暂的有力统治。笔者将从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的组建、职能以及基层行政人员的群体结构等几个方面来论证日伪对基层社会的这种控制状况。

本文正文分为七章,加上导言和结语共九部分。正文安排如下:

第一章概述沦陷时期江苏社会的基本状况,从日军的入侵给江苏社会带来的混乱和财产损失以及日汪的清乡等几个方面来考察。日军的入侵给江浙地区带来极大的混乱,表现为占领前的狂轰滥炸和占领后的乱杀无辜、强暴妇女;同时,日军的入侵致使大小城镇处于无政府状态,地方上的流氓地痞乘机四出劫掠。由于基层社会的混乱,日汪合作于1941年7月发动“清乡运动”。在清乡高潮时期,汪伪政府的统治力较广泛地伸向基层社会。然而汪伪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时间上是短暂的,随着清乡军队的撤离,基层社会迅速恢复到清乡之前的状况;在空间上亦是有限的,非清乡区一仍原样,日伪的统治还是局限于“点”、“线”。

第二章在厘清日伪基层政权组建过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日伪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实际控制程度。沦陷初期日军在各城镇建立的维持会、自治会是一种过渡性组织,具有准政权组织的性质,且多数是地方头面人物主动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产物。就日伪县一级政权的组建来说,清乡以前,大多数县在形式上建立了行政机构,实则有名无

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

实。清乡以后,县政权在机构和人员方面均得到扩充,汪伪中央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对县一级政权较有力的控制。然这仅限于苏南地区,在苏中地区日伪仍不能完全支配县政府;日伪向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扩张和渗透则更不顺利。

第三章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考察日伪基层政权的职能。本章选择日伪政权所谓的“复兴建设”、保甲制度以及日伪在基层社会的恐怖统治等几个方面,来探讨日伪在基层社会的统治方式和实际控制力度。

第四章从经济汲取的角度进一步探究日伪基层政权的职能。日军军粮征购和伪政权的赋税征收一直是基层政权最重要之职能^⑤,纵观江苏沦陷8年,要钱要粮一直是日伪基层军政人员的“日常要务”。本章在详细考察军粮征购和赋税征收的基础上,进一步透视日本侵略者与日伪基层行政人员的关系,以及江苏各级伪政权为控制赋税征收的明争暗斗。

第五章重在讨论日伪县行政人员的来源以及县知事、县长的群体构成。日伪县一般行政人员多半出身于战前国民政府的公务员和教育界人员;另一部分则是夤缘而至者,他们靠同学、同乡、同事或亲戚关系在日伪政权中谋得一职。1942年以前的县知事、县长,大多数是地方上的耆老、商会会长等头面人物;之后则主要是由日伪政权机关任命的较为年轻的人。

第六章探讨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的群体结构,以苏南清乡区为中心。日伪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的构成在清乡前后经历了较明显的变化。清乡以前,基层行政人员的主体是地方上的殷实富户,他们大多曾在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就担任过基层行政职务;清乡以后,由于日伪政权不顾后果的经济剥夺,使原来的一部分伪行政人员离开了该政权,日伪遂任命了地方上一些不太“正直”之人出任区乡镇保甲长。

第七章分析日伪基层行政人员的心态及其命运。日伪基层行政人员的上层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同时受到政治因素、自身因素以及地方因素的影响,他们在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时,都进行或明或暗的抵制,但时人和战后国民政府的汉奸“清理运动”中多强调政治因素和自身因素对前者的影响,认为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十恶不赦的汉奸、贪生怕死、死有余辜等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各国相比,中国对战时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的人处治较为严厉。

本文资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档案资料,分别是中国第二历